

试论郑观应的教育思想

王 学 明

郑观应是中国近代史上颇具影响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家,其思想的核心内容是“富强救国”,他的教育思想即是以此为出发点。

一、“戒虚”“务实”的变革观

郑观应的一生,几乎与中国近代史相始终,他生活的年代正值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加紧扩张,中国社会性质发生深刻变化,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年代。面对严峻的社会现实,为拯救民族危亡,郑观应提出了积极变革的主张。他继承了鸦片战争以来有识之士的“变局”思想,认为十九世纪中叶以来,中国面临着一个“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要同外国侵略势力抗衡,就必须进行全面变革。他引用《易经》的话说,“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认为世上无“千古不弊之政”,亦无“千古不变之法”,他继承和发展了林、魏“师夷长技”的思想,提出“取远情,师长技,攻其所短,夺其所恃”的观点,主张了解西方,学习西方,将西方的先进技术化为我所有,为我所用。这样,十数年后中国将“无难与泰西相颉颃”。郑观应的教育思想正是在这个“大变局”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因此“变革”必然成为其教育思想的主线。

十九世纪中后期,中国教育仍延续着隋唐以来以应科举考试为主要目的,以儒家经义为主要内容的传统教育模式。这种落后的科举制度严重阻碍了西方先进科学文化知识的引入与传播,阻碍了新式人才的培养,如果不从根本上进行改革,必然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郑观应的教育思想正是从变革科举,提倡西学开始产生形成的。

郑观应变革科举制度的主张,主要体现于两个方面:一是调整科举考试内容;二是改造旧式书院学宫,兴办新式学校。

郑观应于八十年代初刊行的《易言》三十六篇本中,即提出了改革科举考试内容的设想,主张将文科考试分为四类,“一曰考经史以观实学。二曰策论时事以观卓识。三曰兼试诗赋以验其才华。四曰博询政事以考其吏治”。武科亦分三类,“一询山川形势,军法进退,以观其韬略。二问算学,格致,机器制造,以究其造詣。三考测量枪炮高低命中及远,以尽其能事”。这个方案一反文试经义八股,武试弓马刀石的惯例,充实了大量“实学”内容,充分体现了郑观应反对“无用之学”,提倡“实学”的观点。文科考试内容以“经世致用”的“经济学问”为主,武科则已有相当部分是西学的内容,这无疑是对旧式科举制的重大冲击。此外,他还提出了将西学列入科举考试的初步设想。《盛世危言》中,郑观应的这一思想有了较大发

展,明确提出“于文,武岁科外,另设一科,专考西学”。其内容为,“一试格致、化学、电学、重学、矿学新法。二试畅发天文蕴精,五洲地舆水陆形势。三试内外医科,配药及农家植物新法”,并主张西学生员的录取标准应是“论其艺不论其文,量其才而不拘资格。”对于那些除制艺外一无所长者,则主张“虽文字极优,亦置孙山之外”不予录取。郑观应主张将西学列为正式考试科目的目的是为了借此提高西学的社会地位,将一味醉心于搏取功名的中国知识分子阶层导向西学领域,扭转当时重“时文”,不耻为西学的状况。他认为“时文不废,则实学不兴;西学不重,奇才不出”。“必以重时文者而移之于重西学,俾人人知所趋向鼓舞而振兴之。数年之后不有人才济济者,吾不信也。”

郑观应意识的,要在中国培养新式人才,靠“只知教习举业”的旧式学塾是行不通的,必须引进西方的教育机制,建立中国近代教育模式,兴办新式学堂。他根据中国的现状,提出了较为可行的改革方案,“窃谓中国自州、县、省会、京师,各有学宫书院,莫若仍其制扩充之,仿照泰西程式,稍为变通:文武各分大、中、小三等,设于州、县者,为小学,设于各府者为中学,设于省会、京师者为大学”,“各乡亦分家塾、公塾,无论贫富皆可读书习艺”。其考核内容分为文武两大类:文科分为文学、政事、言语、格致、艺学、杂学等六科;武科分为陆军、海军两科。除文学、政事两科外,均为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政治学说。这个方案包括了从乡塾、小学、中学、大学各级学校组成的教育体制,虽然尚不完善,但是他提出了建立中国近代教育体系的构想,对后来中国近代教育体制的制定,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二、“体”“用”兼备的西学观

郑观应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中,积极主张学习西方的杰出代表之一。他在深入研究西方社会的基础上,提出了学习西方要“体用兼备”的观点。“余平日历查西人立国之本,体用兼备。育才于书院,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此其体;练兵、制器械、铁路、电线等事,此其用”,他强调中国不仅要学其“用”,还应该学其“体”,否则是“难臻富强”的。从这一观点出发,他主张学习“西学”,应既包括西方的自然科学和工艺学等先进技术,也包括西方的社会政治学说。他在《易言》中,全面介绍了西方各国的教学科目,并将其划分为四大类,“经学者论教中之事。法学者论古今政事利弊异同,及奉使外国修辞通商有关国例之事。智学者格物性理、文字语言诸事。医学者首以格物统核全身,及内外诸部位,次论经络表里功用,次论病源制配药品,次论胎产接生。”这种划分不一定科学,尤其是将宗教“经学”列于首位,作为一门学科介绍,是不妥当的。这反映了郑观应当时的思想局限性。《盛世危言》中,他做了大幅度调整,将西学划分为天学、地学、人学三大类,把“经学”排除在外。“天学”包括天文、算法、历法、电学、光学等内容;“地学”包括地舆、测量、经纬、种植、车舟、兵阵等内容;“人学”包括语言文字,政教、刑法、食货、制造、商贾、工艺等内容。他们可以看出,不论是《易言》划分的四类,还是《盛世危言》划分的三类,均体现了郑观应“体用兼备”的观点,是既包括了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又包括了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内容的。

尽管后来郑观应在教育活动中,并未尽力推广西方的社会政治学说,但他的这一观点在中国近代史上曾产生过相当的影响,他对西方政治体制的介绍,对中国知识分子起了启蒙作用。

对于如何处理“中学”与“西学”的关系,郑观应提出了“中学为本,西学为末”,“主

以中学，辅以西学”的观点。从表面上看，郑观应的观点同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点是基本相同的，实质上他们之间是有重大区别的。首先，郑观应主张的“西学”是“体用兼备”的，与张之洞的仅指格致、制造等自然科学技术的“西学”是有本质区别的。其次，郑观应主张的体与用、本与末，主与辅之间是辩证统一关系，它们之间是相互包容，发展变化的。即“虚中有实”，“实中有虚”，西学可以化为中学。郑观应提出的实现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的政治主张，就是以西学之“体”（君主立宪制）变革中学之“体”（君主专制）的典型例子。可见，西学与中学之间并没有不可跨越的鸿沟。第三，郑观应所说的“体用”关系，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层次的。从他在不同篇目中谈到的有关内容来看，它至少有二个层次：中学与西学的体用关系，即“中学为本，西学为末”；西学自身的体用关系，即“育才于书院，论政于议院”为体，枪炮、舟船、铁路、电线等为用。照此类推，中学也应有自身的体用关系，只是郑观应未明确说明而已。

郑观应认为，教育者必须首先弄清楚教学内容的主次关系，即本末关系，才能正确地实施教育。“故善学者，必先明本末，更明所谓大本末而后。以西学言之，如格致，制造等学其本也，语言文字其末也。合而言之，则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知其缓急，审其变通，操纵刚柔，教学之效，其在兹乎。”这里，他又提出了一个“本”“末”关系，作为教学内容的西学自身的本末关系，“格致、制造等学其本也，语言文字其末也”。所以，他主张要学习西学的“本”，学习“其精微广大之处”，不要“粗通文字语言”便“浅尝辄止，有名无实”。在处理教育的中、西学关系时，他主张“必以我国文字学问为始基，而后能融会中、西之学，贯通中西之理”，即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他批评那些“略识洋文，略谙西语，便诋诃然夸耀于世，以为中国文字学问不足学，不必知，弃若弁髦，视同疣赘”的“浮薄少年”，“则非余所敢知也”。郑观应在这里提出了一个民族对待外来文化应有的正确态度，即以本民族文化为根基，包容吸收外来文化的先进因素，以促进社会的发展。这是十分可贵的。郑观应把“中学”作为发展中国近代教育的“始基”，这个态度是可取的，不足之处是他尚不能将纲常名教等封建糟粕同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区别开来。在对待中、西学的态度上，他坚持“不薄待他人，亦不震骇他人，不务匿己长，亦不敢回护己短”。即使用今天的观点来看，这种学习西方的态度也是值得称道的。

三、实业教育、师范教育和贫民教育

郑观应从长期从事近代企业经营管理的经历中，体会到培养懂得近代科学技术的新式人才，是中国教育的当务之急。十九世纪后期，中国被西方列强强行纳入了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使中国稚弱的近代工业，从一开始产生就面临着激烈的市场竞争。从这一现实出发，郑观应提出了与西方资本主义侵略势力进行“商战”的思想，把发展中国近代工业同反对外来侵略有机地结合起来，作为“救国图存”的重要措施。他认为“二十世纪之天下，一商战竞争之天下也”，然而“商战”首先就是人才的竞争。“我国如欲致富强，必从广设学校开始”，因为“商务、实业、工艺与各种人才，无不由学校出”。在中国近代工矿企业中，由于历史原因，技术人员大都是聘请外国洋员担任。这种状况对中国近代工业发展极为不利，至少带来两大弊端：一是外聘洋员的工薪数额巨大，对降低产品成本造成不利影响；二是容易出现外国技术人员操纵控制中国企业的局面。对此有深刻认识的郑观应，不仅在理论上著文积极倡导培养自己的“实业”人才，而且直接参与了实业学校的创办活动。如他在担任轮船招商局会

办和汉阳铁厂总办期间，积极筹办企业所属的技术学校，并长期担任“招商局公学”驻校董事。

对“实业人才”的培养，郑观应主张采取理论学习与实践操作相结合的教学方式。他制订的汉阳铁厂技术学校筹办方案，即主张将其办成“上午读书，下午入厂学习机器”的半工半读学校。对轮船招商局所需航运人才的培养，郑观应建议专门设置练船一艘，“凡驾驶管轮各学生，即在船上学习，无须另设学堂”。这样一面学习理论知识，一面练习实际操纵，既能节约费用，又可快出人才。学习轮机的学员则在各厂学习，除“每天功课外，仍赴各厂练习工艺，考究制造之法”。

郑观应的上述观点，充分体现了一个爱国者和实业家的卓越见识，对中国近代实业教育的创立和发展，做了自己力所能及的努力。

郑观应非常重视师范教育，认为师资的培养是发展近代教育的关键环节，“范方则方，范圆则圆。不善不可为陶冶，故陶冶国民必以师范为基础。”兴办教育，其他条件均可依赖财力解决，“惟有道德、有科学之好教员诚不易得”。因此，他主张“各省急设师范学堂，专门学堂，广育师资。以备充各学堂教授也”。郑观应强调师资的培养，除了以上因素外，还有下述原因：1. 为适应近代教育机制的建立，急需大批具有新思想新知识的教师，以代替那些除“教授举业”外一无所知的旧式塾师；2. 为取代人数众多的外籍教习。“应先设师范学堂，考取深通华文，年二十左右者百人入堂肄业”，“三年后有毕业生可代，可无需借才”，既可节约经费，又可免受制于人。3. 为早日实现将外文教材译为中文，用汉语进行教学。“拟飭毕业诸生将泰西小学、中学、大学文书选择，译以汉文教授，不必通西文而后肄业实学，则费半功倍”。发展教育必须首先培养师资，郑观应在这一问题上的认识是十分明确的，是抓住了发展中国近代教育的关键环节。

郑观应十分推崇西方各国教育中“不论贵贱，男女，自六岁后皆须入学，不入学者罪其父母”的强制性义务教育制，特别注重为贫苦阶层设立各类学校，发展贫民教育。他在改革旧教育体制，建立新式学校的方案中，即明确提出了“无论贫富皆可读书习艺”的主张。他十分重视为贫民创造受教育的机会，以便让贫民学得一技之长，赖以谋生，建议“通飭各省督抚严札劝业道、学务处”设置“工程各学堂及收养贫儿工艺所”。并主张为“急于谋食而不暇入学堂”的贫民，“设半日学堂，或半夜学堂。”到晚年，他还为未能实现“创办机器制造及教养贫民工艺院”的夙愿而深感遗憾。虽然，郑观应倡导的贫民教育，有防止贫民流为“盗贼”、“匪类”，巩固清朝统治的政治目的，但其大力提倡并积极努力为贫民创造接受教育的机会的举动是十分可贵的。这也充分反映了他的教育思想中有教育平等的观点。

* 本文之引文，均见夏东原编《郑观应集》上下册。